

回应时代大势 淬炼小说精品

□刘金祥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中再次强调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明确指出“原创性是好作品的标志。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在观念和手段结合上、内容和形式融合上进行深度创新，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郑重告诫，“如果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精品上，只想着走捷径、搞速成，是成不了大师、成不了大家的”。这些论断和要求既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的价值取向、主要特征和重要途径，又赋予了新时代作家新的精神追求、新的文化使命和新的责任担当。

文艺精品作为思想铸塑、精神升华和审美淬炼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识，处于精神文化价值链体系的最顶端，占据着人类历史思考、社会认知和文化创造的制高点，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艺发展的最高水准，对于人民群众具有陶冶、熏染、感召、启迪、教益、激励和提振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在我国文学艺术漫长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诗、词、赋、曲、散文和小说等每一种文体都曾有其勃发时期和鼎盛年代，都曾产生了众多辉耀史册的名篇佳作，都曾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主要样式，其创作与发展虽然具有自身的规律、逻辑、法度和机制，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和无法否定：只有那些反映时代巨变、聚焦现实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只有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性作品，只有那些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且经得住时光淘洗磨砺的传世力作，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精品或文艺经典，正如美国“耶鲁学派”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不能让读者重读的作品无论如何算不上精品”。文艺自身演绎历程一再表明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文学创作贵精而忌滥、求美而弃庸，中外文学发展史也反复引证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几乎每部小说精品都是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佳构妙作，其不仅具有深湛的主题意蕴、典型的人物形象、新颖的行文结构和难以复制的美学范式，而且天然地赋有引导人们趋美向善、崇德益智、褒贬优劣、激浊扬清的殊异价值，换言之，一部吸引力大、感染力强、生命力旺的小说精品，一方面葆有为民族塑像、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明德的独特功能，另一方面臻于文学性、思想性、审美性高度契合的完美境界。我国具有小说创作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古代和近现代涌现出诸如四大古典名著、《阿Q正传》《狂人日记》《林家铺子》《子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呼兰河传》《围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文质俱佳的小说精品，成为不同时代助推社会进步和开启读者心智的文艺质点和亮晶。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我国文坛诞生了一批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在内的优秀小说作品，但令人忧戚且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是，以小说为主体的虚构文学的兴盛时代，似乎正在走向式微和衰落，与之相伴，葆有经典属性的小说精品越来越稀少奇缺，而彪炳史册、碑传后世的鸿篇巨制则更是凤毛麟角，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在内的诸多小说作品，迄今并未进入当下多数国人的阅读视野，尚未成为被时下读者接受且流布广泛的传世精品。与此同时，大量“三俗”类小说作品充斥于书店书市，纷纷涌人读者精神领域。这些质次品低的小说作品主题空泛、思想消极、格调低下、制作粗糙，不仅使读者饱受庸品之鸩、备受劣品之扰、遍尝赝品之烦，而且弱化了人们价值探求、矮化了人们审美取向、钝化了人们精神情趣。作为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小说精品既要有时代的温度，也要有文化的温润，更要有人的温情。在加速度与世界文化接轨融合、高频率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当下，我们可以坦率地直言：在当代世界文学坐标系里，我国除了张洁、莫言、阿城、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麦家、马原、余华、苏童、迟子建、刘慈欣等少数作家的小说作品之外，当下的小说精品的确比较匮乏为短缺。尽管文学发展史表明，100年没有文学精品绝非怪事；尽管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从18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小说精品有兴致的国人只能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精品小说作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审美传统和道德理想在作家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和集中反映，一位作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维空间之间书写了蕴含着人类共同情感的时代故事和生活传奇，依靠自己的社会判断力、历史洞察力和精神表达力，创作出展示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小说是时代的缩写。当今时代我们面对的是风云变幻莫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深彻的历史变迁，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伟大的时代必然要求包括小说创作在内的文学艺术以现实主义精神烛照当下现实，必然要求作家以现实主义态度和浪漫主义情怀创作具有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涵括力的小说精品。

社会风貌、修补文化裂痕、凝聚民族精神、引发读者共鸣的小说作品，无论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抑或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些经典小说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人性的本质诉求，而且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心理和愿望，从而成为被中外读者争相传阅的旷世精品。

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2018年我国作家推出了《考工记》(王安忆)、《重新生》(张平)、《天黑得很慢》(周大新)、《云中记》(阿来)、《牵风记》(徐怀中)、《候鸟的勇敢》(迟子建)、《黄冈秘卷》(刘醒龙)、《幸存者》(陆天明)、《风声(2018版)》(麦家)、《山本》(贾平凹)、《主角》(陈彦)、《人世间》(梁晓声)、《修改过程》(韩少功)、《穹庐》(肖亦农)、《北归记》(宗璞)、《太阳升起》(彭荆风)、《刻骨铭心》(叶兆言)、《天上有太阳》(杜斌)等一批口碑较好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品在变动纷居、缤纷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通过题材深度开掘与多种表现方式的运用展现出日益丰富的时代样貌，彰显出当代作家认识时代与解读时代的能力有所提升，无论是艺术表现还是内容架构，都呈现出不同的文学特质和美学风格，尤其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切介入和立体刻画，状摹出人民激昂的精神状态与时代绚丽的精神风貌，勾勒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中人物的命运沉浮，在一定程度上发掘出人类精神世界深处的幽暗与光芒。但从人类精神层面与艺术高度来衡量和甄别，这些小说与“代表某一个文学时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效仿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的精品小说还有距离。但也许正是由于精品小说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证明和文明符号，是文学创作的引擎与标杆，所以，现实中一些学者和读者仍在孜孜寻找光彩夺人的小说精品，依然在殷殷期盼价值灿耀的经典小说，对精品小说怀抱揣着莫大期许和种种幻想。当今小说创作之所以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粗制滥造、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诸多乱象，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繁荣假象，固然有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审美价值遭到质疑、新时代精品小说创作标准尚未确立这一客观因素在作祟，以致于一些作家面向故纸堆“翻箱倒柜”、寻经问史，深入到现代文学史中寻找优秀长篇作品并藉此开掘和提炼经典成分。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精品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而传世精品是优秀传统文化涵寓的产物，是高洁灵魂和超拔智慧融合的衍生品，也就是说精品小说是在主观力量共同作用下濡化而成的，尤其是创作主体苦心孤诣、辛勤劳作、充分释放内宇宙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品小说是被历史地文化地建构起来的。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当前我国小说创作现状堪忧，使得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也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境地，以占据文学创作结构主体地位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为例，由于近年来很多小说创作涉猎题材领域狭窄、跨越时空幅度仄小、状绘社会心理空泛、表现手法简陋，以致于我国文艺理论界无法从审美角度尤其是从叙事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和评判，许多批评家不得不借用文化、道德、启蒙、批

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在诗论中将“诗人与谁交谈？”视为“一个痛苦的、永远现代的问题”。诗人与谁交谈？这确实是一个复杂深刻的、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思索的问题。它意味着诗人在面对“具体的交谈者”、“时代的听众”、“同辈中的朋友”、“未来的同代人”等等不同对象时，将如何处理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悟；诗人与自我、他者和社会的关系是何种情形，诗人又会从哪些维度去理解并体现诗人在时代中的位置？

诗人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共生于同一个时代。属于该时代的现实经验为诗人提供了最直接的艺术源泉，从古到今莫不如是。无论是写下“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的杜甫，还是写下“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的王昌龄；无论是行吟泽畔的屈原，还是醉卧沙场的辛弃疾……他们的诗篇无不浸透着诗人对现实的观照、对世人的关怀，他们的心灵之火也使后世的读者为之燃。T·S·艾略特在《诗歌的社会功能》中认为：“诗的最广义的社会功能就是：诗确实能影响整个民族的语言和感受性”。我认为艾略特所说的这种“民族的语言和感受性”就是每个民族在各个时代所积累的民族精神及诗性。它不仅体现了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嬗变，也是一个民族如何辨别、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的内在动力。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新诗百年，就是一个不断获得新经验、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丰富民族的语言和感受性的过程。特别是新诗诞生之初，诗人们获得了新的思潮、新的视野、新的言说方式，很多词汇和话语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面貌进入诗歌的空间，获得了新的生机。

诗人使用语言与世界对话，而语言是在时代中演进的。与其说我们的语言在表达我们的生活，不如说我们的生活在模仿我们的语言。在任何时代，无论是诗歌语言还是人们日常的言谈，语言是精进还是腐败，都跟我们生活着的真实世界息息相关并相互匹配。所以，一个诗人不仅要关注诗歌内部的变化和递进，更要关注外部现实世界对语言的建设或损毁。所有时代的诗人，都理应成为与“当下”最直接的对话者，更应担负起建设母语及其诗性的责任。这也是考察一个诗人是否成熟、是否具备写作自觉的一个向度。诗人勒内·夏尔曾在《修普诺斯散记》中写过，“诗人不能在语言的平流层中长久逗留。他必须在新的泪水中盘绕，并在自身的律令中继续前行。”“新的泪”包括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刻洞察、对新的生存经验的体悟、对新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对新的美学体系的构建。而“自身的律令”则包括对伟大民族传统的敬畏和学习，以及对诗歌本身的不断更新和觉悟。

身处新时代的我们，面临的生存经验和生活方式较之以往时代是复杂的，同时也是开阔、多元的。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新兴的传媒技术势如破竹，“异处”的世界变得唾手可得，也使得“当下”呈现了多重的空间性，世界仿佛在一个扁平又多维的时空中运行。譬如，在国际化的都市人们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刷脸可支付、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乘高铁便可朝夕至、与大洋彼岸的人可实时视频会话、人工智能已经会作诗……但在边远的乡村，农人还在刀耕火种，年轻人则大规模离开土地、离开农耕生活。这是一个可以歌颂和平与安宁的时代，也是一个依然有战争和灾难不断出现在国际报纸头版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正在紧密连接、同质化增强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性更加珍稀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一个在科幻作品中更能深刻表达对人类命运忧思的时代。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诗人，不仅要懂得倾听时代的语言，还要有与之对话的能力。一个新时代的“对话者”，不仅考验着我们自身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还考验着我们是否具备了与这个时代相对应的心灵天赋和智识，这天赋和智识来源于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每一个“此时此刻”。我们如何见证城市的变迁、如何观察一朵花的开放、如何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感同身受、如何在千万人之中找到我们的旅伴、如何关切遥远世代发生过的事情……这些都是“此时此刻”，是生活的语言赋予我们诗性的品质，它包含了诗人对自我的认知，对他人的理解，对“当下”的观照和建构。诗人所寻求的“对话”，正是从这样的时刻中到来，那些潜在的交谈者则可能在任意时空出现或穿梭。

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过往时代都能寻找到这样的“对话者”，他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人类存在的实证”，还在未来时代找到他们的“交谈者”，这也便是伟大诗歌和伟大诗人的魅力，他们用各自的“此时此刻”造就了艺术的永恒。即使在今天，我们读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读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读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米沃什)，读到“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济慈)，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超越时代的心灵共振。诗人关于人类的感情、困境、梦想、追求和渴望的书写，他们关于人性的思索，关于时间、自然与宇宙的思考，在任何时代都是相通的。那些伟大心灵所创造的世界，必然有超越时空的属性，它不仅鲜活地启示着当时的现实，更预言着人类的未来。因此，要在“在后代中寻觅读者”，诗人的使命必须也必然要超越对我们个体命运的关注和审视。这也对诗人在当下的对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不仅仅是一个自我的歌者，他的吟唱要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他必须要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我们共同面临的处境和去向。

在这个社会交互性极强、信息化加速的新时代，人类的际遇、困境、生活方式是纷繁复杂的，人们的心灵风貌也展现出丰富深邃的面貌。在这样的时代，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同时也是困难的。它让我们对各种新的生活经验应接不暇，同时，又提醒着我们保有一种清醒的立场，才能不断锤炼从瞬间提炼永恒的技艺。我们与“现在”共生，又瞻望着“异代”。当诗人审视世界、面对公共事务和事件发声时，也许保持适当的距离更能抽象出事物的普遍性，从而使诗歌具有超拔的时代品格。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就以“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而著称，这种全力的投入和有距离的审视，使辛波斯卡的作品具有一种严肃的生命力，即使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细节，也因为“一粒沙看世界”的眼光而具有了隽永的意涵。

近些年，我每年都会从城市返回乡村，从不断扩张的现代都市到仿佛数十年未改变的山村，我认真体会着脚下被历代诗人涉足、所吟咏过的土地，它以丰沛的补给滋养了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母语则像一棵从未停止生长的树，不唯诗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影响这植株的繁茂或衰萎。在现代都市，世界语言的混杂给我们带来新的视野，在乡村，我们还能捕捉到一些古旧的汉语之音。在疾速和缓慢之间，在一些被保留的风土民俗之中，会让人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时空错乱之感。而这样的错乱感正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个特征：驳杂、参差、充满众多可能性。如果说我们的写作是“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我们的时代正综合着过去历史的记忆，而我们的此刻也正在变成此后的记忆。我们在当下的“对话”也将进入时空的隧道，去未来时代寻找交谈者。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这些诗句若要抵达接收者，就像一个星球在将自己的光投向另一个星球那样，需要一个天文时间。”

什么样的诗歌才会穿越漫长时日拥有未来时代的回响呢？那便是人类记忆的伟大、创造的伟大，那最终属于人类心灵的尊严和荣光。诗人也因之成为了每个时代最卓越的对话者，而一定会有“一个遥远的后代/在我的诗中发现这一存在”。

新时代的对话者和未来时代的交谈者

□冯
娜

